

“哈希姆认同”：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 与建构路径*

闫 伟 田鸿涛

内容提要 “哈希姆认同”是对先知穆罕默德所属圣裔家族的认同，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具有了宗教认同、政治认同乃至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的意涵。1921年外约旦建国后，面临着如何构建国家认同的难题。阿卜杜拉国王借助“哈希姆认同”推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大叙利亚的统一，外约旦的国家认同并非主要关注点。20世纪中后期，约旦对“哈希姆认同”进行新的阐释，即在阿拉伯主义的语境下，强调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本土属性、圣裔身份和圣地保护者的角色，以及对现代约旦的历史贡献。借此，叙说约旦历史的连续性，约旦因哈希姆家族也具备了独特性和集体认同。而哈希姆家族则淡化了作为约旦“外来者”的色彩，提升其政治合法性。“哈希姆认同”与约旦国家认同合二为一，体现出某种共生关系。约旦将传统宗教政治文化现代化，使之成为民族建构的资源与动力。这也成为除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外的独特的民族建构路径，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约旦的稳定之匙。

关键词 政治文化 约旦 “哈希姆认同” 民族建构 政治稳定

作者简介 闫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西安 710069）；田鸿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069）。

身份政治和民族认同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议题，亦是制约现当代中东发展的关键变量。特别是“新月地带”诸国的族群、教派构成极其复杂，如何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阿拉伯国家政治继承问题研究”（18ASS0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的中肯的修改意见，错漏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构建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已然成为相关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① 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乃至以色列莫不如此, 阿富汗、塞浦路斯、土耳其也深受族际冲突的困扰。民族认同危机甚至引发严重的内乱。约旦哈希姆王国^②作为“沙聚之邦”^③, 地处中东冲突的“风暴眼”, 却相对稳定。这与约旦独特民族建构路径不无关系, 其独特性在于将传统的政治文化, 即“哈希姆认同”进行符合时代的阐释, 使之成为约旦现代民族认同的基石, 在维护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同时, 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国外学界主要关注于约旦民族认同的历史变迁、族际关系等内容, 但对于“哈希姆认同” (Hashemite Identity) 缺乏系统的研究, 因此不能完全解释约旦这样一个缺乏历史基础、资源贫瘠并且社会具有异质性的王国, 为何能够相对成功地建构民族认同。^④ 国内学界主要关注于部落问题与约旦国家构建等问题, 对于约旦的民族认同研究并不充分。^⑤ 本文以“哈希姆认同”的变迁为主线, 系统剖析作为政治文化观念的“哈希姆认同”的嬗变, 以及对于约旦民族建构的影响, 为认识当代约旦的

① 本文的民族建构 (nation building), 强调的是建构国家民族 (nation) 认同的历史进程。

② 约旦在不同时代称谓不一, 1921 至 1946 年为外约旦酋长国 (Emirate of Transjordan, 或称“外约旦埃米尔国”) 时期, 即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外约旦” (Transjordan)。1946 年外约旦独立, 改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 (亦有说法称其为“外约旦哈希姆王国”), 1948 年, 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部分领土, 1950 年两地统称为“约旦哈希姆王国”, 延续至今。本文以名从史出的原则, 按照不同时代约旦“国名”来指这个国家。

③ 约旦 98% 以上的人口为阿拉伯人。主要由约旦本土居民 (外约旦人)、巴勒斯坦难民、切尔克斯人、车臣人等构成, 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一般认为巴勒斯坦人占到 60% 以上。阿拉伯民族认同是近现代的产物, 并非完全是政治认同。为行文方便, 尽管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皆属阿拉伯人, 本文将之视为不同“族群” (ethnic group), 将整体上的约旦人视为国家民族 (nation)。参见中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 《约旦国家概况》, <http://jo.chineseembassy.org/chn/zjyd/gjgk/t142982.htm>, 2020-10-20。

④ Elena D. Corbett, *Competitive Archaeology in Jordan: Narrating Identity from the Ottomans to the Hashemit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Myriam Ababsa and Rami Daher, *Villes, Pratiques Urbaines et Construction Nationale en Jordanie (Cities, Urban Practice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Jordan)*,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1; Aryeh Shmuelevitz and Asher Susser eds., *The Hashemites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Essays in Honour of the Late Professor Uriel Dann*, London: Frank Cass, 1995; Mohammed Tu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Jordan: Historical Pathway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4, Issue 6, 2016, pp. 985-1002; Curtis R. Ryan, “Identity Politics, Reform, and Protest in Jorda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3, 2011, pp. 564-578; Stefanie Nanes, “Hashemism,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bu Odeh Episode”, *The Arab Studies Journal*, Vol. 18, No. 1, 2010, pp. 162-195.

⑤ 韩志斌、薛亦凡 《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 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1 期, 第 118-139 页; 李茜 《约旦民族国家构建演进历程与特点》, 载《科学经济社会》2015 年第 1 期, 第 76-82 页。

政治稳定提供一定的镜鉴。

一 “哈希姆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及流变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形成的。”^①“哈希姆认同”历史上长期盛行于伊斯兰世界，是重要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也是政治合法性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渊源。它具有多个维度，不同时代的侧重也有所差异。但究其本源而言，“哈希姆认同”是对哈希姆家族（Banu Hashim）的认同。后者在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享有盛誉，它属于古来氏部落（Quraysh），阿拉伯人将之视为易卜拉欣（Ibrahim，即亚伯拉罕）的直系后代。^②公元480年，哈希姆家族迁至麦加，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③并在以麦加为中心的红海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哈希姆家族成为阿拉伯部落谱系中最尊贵的一支。“哈希姆认同”最初基于血缘关系，属于部落认同。

伊斯兰教诞生后，由于穆罕默德出自哈希姆家族，后者具有了圣裔（Ahl al-Bayt）的身份属性。“哈希姆认同”也增添了新的含义，即穆斯林对穆罕默德及所属哈希姆家族的宗教推崇。根据伊斯兰教教义，所有穆斯林都要爱戴圣裔家族，中东穆斯林在礼拜时大都祝福圣裔家族“真主，祝福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庭”。^⑤尽管在伊斯兰世界，自称圣裔者不计其数，但哈希姆家族作为最重要的圣裔家族，其成员具有“谢里夫”（Sharif）或“赛义德”（Sayyid）的头衔。^⑥遍布伊斯兰世界的苏非派也大都强调自身的圣裔传统，并享有免税和免服兵役等特权。“哈希姆认同”成为重要的宗教象征。在穆罕默德时代，

① [美国]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 G. 宾厄姆·鲍威尔著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② 根据阿拉伯人的说法，易卜拉欣两子伊斯玛仪（Isma'il，即Ishmael）和伊斯哈格（Ishaq，即Isaac）分别为阿拉伯人、犹太人的先祖。

③ Ahmad El-Sharif “Constructing the Hashemite Self-Identity in King Abdullah II's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6, No. 1, 2014, p. 38.

④ G. R. Hawting, *The First Dynasty of Islam - The Umayyad Caliphate AD 661 - 75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2.

⑤ Cenap Çakmak, *Islam: A Worldwide Encyclopedia*, Vol. 1,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17, p. 72.

⑥ “赛义德”本意为“首领、先生”，“谢里夫”（复数为“阿什拉夫”）本意为“贵族”或者“地区治安官”。

哈希姆家族在政治上并无特权。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去世，由于缺乏明确的继承制度，围绕哈希姆家族成员是否具有继承权的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哈希姆认同”也具有了政治认同的因素。

当时，所谓的“合法主义派”(Ahl al-Nass) 出现，其核心理念在于：哈里发须由真主选择的哈希姆家族成员世袭，^① 兼具宗教和世俗权威。^② 当时的哈希姆家族主要指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 (Ali ibn Abi Talib) 与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 (Fatimah al-Zahra) 的后代，即所谓的阿里家族 (Alids)。这一派别反对穆罕默德之后的前三位哈里发，以及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阿里遇刺后，“合法主义派”拥戴阿里之子哈桑 (Hassan ibn Ali) 和侯赛因 (Husayn ibn Ali) 继任哈里发^③，反对倭马亚王朝^④的统治，意图实现哈里发在哈希姆家族内部的继承。倭马亚王朝时期，哈希姆家族遭到压制，在帝国政治领域被边缘化，但“哈希姆认同”的政治属性并未湮灭。以阿里家族为代表的“哈希姆什叶派”强调哈里发的哈希姆血统论，否认前三位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的正统性。“哈希姆认同”最终发展成为什叶派核心理念，即什叶派的伊玛目都应在哈希姆家族内部世袭，成为什叶派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⑤ 直至 16 世纪初，波斯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立为国教。

公元 750 年，阿拔斯人 (Abbasid) 以“还权于先知家族”为口号，^⑥ 将早期哈希姆家族的政治实践抽象化为“哈希米耶” (Hashimiyyah) 思想：其一，重新界定了哈希姆家族的范围，将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后代也界定为哈希姆家族成员；^⑦ 其二，力主推翻倭马亚王朝的“不义统治”，哈里发之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担任。是年，阿拔斯人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建立了阿拔斯王朝。因而，该王朝将“哈希姆认同”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渊源。但此举同样受到阿里家族的抵制，后者认为只有阿里和法蒂玛的后代才是真正

①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1953, p. 179.

② Hugh Kennedy, *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38.

③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92 页。

④ 事实上，倭马亚家族与哈希姆家族同属古来氏部落。倭马亚家族的祖先阿卜杜·舍姆斯 (Abd Shams ibn Abd Manaf) 与哈希姆家族的祖先哈希姆 (Hashim ibn Abd Manaf, Amr al-Ula) 为兄弟，同为阿卜杜·麦那夫 (Abd Manaf ibn Qusai) 之子。

⑤ Cenap Çakmak, *Islam: A Worldwide Encyclopedia*, Vol. 1,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17, p. 72.

⑥ 金宜久主编：前引书，第 121 ~ 125 页。

⑦ Hugh Kennedy, *op. cit.*, p. 42.

的哈希姆家族，具有哈里发的继承权。北非的伊德里斯王朝（Idrisid Dynasty）和法蒂玛王朝（Fatimid Dynasty）统治者皆自诩为出自哈希姆家族，属于阿里的后裔。“哈希姆认同”不仅是对圣裔的宗教情感，更是一种政治文化和认同观念。

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哈希姆家族作为宗教象征，依然具有重要地位。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穆罕默德的外孙哈桑成为麦加的第一任谢里夫（Sharif of Mecca）^①。公元10世纪，阿拔斯王朝与法蒂玛王朝争雄，哈希姆家族的正统地位也成为争夺的焦点。双方都拉拢麦加的哈希姆家族，以便提升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哈希姆家族成员开始正式领有麦加埃米尔的职位，成为麦加的宗教领袖和世俗统治者。此后，哈希姆家族仍然是中东各个王朝竞相拉拢的对象，借此提升统治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现代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正源于此。北非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皆承认哈希姆家族的麦加谢里夫地位。至此，“哈希姆认同”兼具宗教认同与政治认同，成为中东传统政治文化与正统性的重要来源。中东一些部落组织、苏非教团也都将自身的起源追溯至哈希姆家族，以提升自己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使中东摆脱了4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并囚禁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穆瓦塔基勒三世（Al-Mutawakkil III），后者被迫将哈里发之位授予奥斯曼素丹。奥斯曼素丹并非出自哈希姆家族，因此需要进一步阐释其哈里发地位的正当性。一是奥斯曼帝国塑造“奥斯曼素丹即哈里发”的观念。11世纪之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分裂，哈里发作为世俗统治者的身份日益弱化，更多体现的是宗教的象征。在此背景下，中世纪著名的教义学家安萨里和伊本·泰米叶提出了对哈里发的新界定：哈里发并非一定出身于哈希姆家族，素丹即是哈里发。^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哈里发与哈希姆家族的关联性。“哈希姆认同”作为政治合法性观念遭到削弱。二是奥斯曼帝国将麦加、麦地那以及耶路撒冷纳入直接

① 麦加谢里夫为圣城麦加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世俗统治者。维护当地治安和朝觐的秩序是其重要的职能。

② 相关讨论参见李林《谁之继承人，谁之代治者？——哈里发学说的演变及其对中东政治继承与换代的影响》，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0~119页；Hüseyin Yılmaz, *Caliphate Redefined: The Mystical Turn in Ottoma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07-228.

控制，并削弱哈希姆家族的影响力，挑拨哈希姆家族内讧。^① 奥斯曼帝国尽管保留了哈希姆家族作为麦加宗教领袖的“谢里夫”头衔，但剥夺了其作为世俗统治者“麦加埃米尔”的职位，麦加谢里夫皆由奥斯曼帝国任命。

19 世纪后期，大叙利亚地区^②兴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阿拉伯文化的独特性，尤其是闪米特文化在该地区的悠久历史，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麦加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sein ibn Ali）作为哈希姆家族的首领，闻风而动。1916 年，他在英国支持下发动了“阿拉伯大起义”（Great Arab Revolt）。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哈希姆家族被视为易卜拉欣之子伊斯玛仪的直系后代，亦是阿拉伯民族的两支：即南部的卡坦族（Qahtan）^③ 和北部的阿德南族（Adnan）的共同祖先。^④ 因此，哈希姆家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阿拉伯民族统一的象征，谢里夫侯赛因借此进行民族动员。“哈希姆认同”也具有了“泛阿拉伯主义”的性质。^⑤ 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给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的电报中指出：“所有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麦加和麦地那的圣地，都发来无数封效忠侯赛因国王的电报，承认他为哈里发。侯赛因国王因此接受了哈里发的地位。”^⑥ 谢里夫侯赛因的目标并非名义上的哈里发国，而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帝国。“这一观念存在于哈希姆家族的集体历史记忆中，在那里也有来自古来氏部落和先知家族的优越感。”^⑦

谢里夫侯赛因领导哈希姆家族和阿拉伯人攻占了大叙利亚地区，力图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并自称哈里发。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秘密达成《赛克

① 哈希姆家族的内讧围绕达维奥恩（Dhawu - 'Awn）和达维扎因（Dhawu - Zayd）两个支系展开，现代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来自达维奥恩支系。

② 大叙利亚地区也被称为“黎凡特（Levant）地区”或“沙姆地区”（Bilad al - Sham），即大致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See Y. Porath, “Abdalla's Greater Syria Programm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0, No. 2, 1984, pp. 172 - 189.

③ 卡坦族又译作“盖哈唐人”。

④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 118.

⑤ C. Ernest Dawn, “The Amir of Mecca Al - Husayn ibn - 'Ali and the Origin of the Arab Revol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4, No. 1, 1960, p. 21.

⑥ “High Commissioner for Palestine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O 371/10217/E 2187, No. 86, March 7, 1924, from Joshua Teitelbaum, “Sharif Husayn ibn Ali and the Hashemite Vision of the Post - Ottoman Order: From Chieftaincy to Suzeraint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4, No. 1, 1998, p. 116.

⑦ Joshua Teitelbaum, op. cit., p. 106.

斯—皮科协定》(Sykes - Picot Agreement) 的背景下, 谢里夫侯赛因未能遂愿。^① 在英国的安排下, 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 (Abdullah I ibn Hussein) 和费萨尔 (Faisal I ibn Hussein) 分别担任外约旦埃米尔和伊拉克国王, 直到1946年, 约旦一直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

由此不难发现, “哈希姆认同”作为宗教政治文化贯穿于整个中东伊斯兰文明史。它具有多个层面的内涵和时代性的特征。伊斯兰教诞生前, “哈希姆认同”具有家族和部落认同的属性。在伊斯兰教诞生后, 它又成为穆斯林所敬仰和效仿的对象, 成为宗教象征与认同。而在穆罕默德去世后, 围绕阿拉伯帝国的继承问题, “哈希姆认同”逐渐由边缘步入中心, 增添了政治认同的属性, 并成为阿拔斯王朝及一系列阿拉伯地方政权合法性的渊源。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哈希姆认同”不再是成为正统哈里发的必要条件, 但它在中东尤其是该地区什叶派中具有重要地位。“哈希姆认同”本身具有泛伊斯兰色彩。哈希姆家族领导阿拉伯大起义, 又赋予其“泛阿拉伯主义”的内涵。可见, “哈希姆认同”十分庞杂, 并非单数而是复数。1921年, 外约旦建国后, 哈希姆家族居于统治地位, 但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 即哈希姆家族作为外来者, 统治外约旦的政治合法性不足。“哈希姆认同”是其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 外约旦当政者利用这一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建构现代国家, 尤其是使之统治合法化。

二 “哈希姆认同”与外约旦民族建构的困局

约旦属于大叙利亚地区。19世纪, 奥斯曼帝国在此设立了阿勒颇 (Aleppo)、大马士革 (Damascus) 和西顿 (Sidon) 三个行省 (Vilayet)。^② 约旦从未作为统一的行政区域而存在, 现代约旦是“人造的国家”,^③ 不存在特定的民族认同观念, 约旦人只认同于部落、宗教或者特定的地域。^④ 1921年,

① Efraim Karsh and Inari Karsh, “Myth in the Desert, or Not the Great Arab Revol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3, No. 2, 1997, pp. 302 - 303.

② Fruma Zachs and Sharon Halevi, *Gendering Culture in Greater Syria: Intellectuals and Ideology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5, p. 8.

③ Anthony Billingsley,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Arab World: Constitutions, Family Loyalties and Isl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3, p. 123.

④ 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 - Edwan, *op. cit.*, p. 987.

外约旦酋长国 (Emirate of Transjordan) 建立后, 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哈希姆家族成为外约旦的统治者, 但它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 并非外约旦的本土力量。在外约旦埃米尔, 也是后来的约旦首位国王阿卜杜拉统治时期 (1921 ~ 1951 年)^①, 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统治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不仅要面对如何建设现代国家体系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何叙说哈希姆家族在外约旦统治的合法性, 以及构建外约旦的民族认同。圣裔身份是哈希姆家族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和认同资源。然而, 在阿卜杜拉统治时期, “哈希姆认同” 仍然是传统的宗教政治认同, 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并不完全协调, 两者存在一定矛盾。

第一, “哈希姆认同” 具有“泛伊斯兰认同” 的色彩, 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认同的边界。外约旦建国之初, 社会的同质性较高, 主体为外约旦人, 属于阿拉伯人, 绝大多数为穆斯林。^② 哈希姆家族作为圣裔家族, 在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当时, 外约旦社会以贝都因部落组织为基础, 城市地区处于定居部落控制下, 沙漠地区则被贝都因部落控制。血缘文化根深蒂固, 族长拥有绝对权威。^③ 部落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注重血统。哈希姆家族作为圣裔获得了外约旦部落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可。^④ 本质而言, 哈希姆家族的地位主要依靠宗教支撑, 是穆斯林对先知家族的宗教情感, 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

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具有领土特征,^⑤ 强调在一定时空边界下的集体身份。事实上, 即便是宗教认同, 哈希姆家族仍然受到外界挑战。由于哈希姆家族依靠英国的力量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 未能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独立与统一, 哈希姆家族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遭到批评。1924 年, 土耳其废除哈

① 其中, 1921 至 1946 年为外约旦埃米尔, 1946 至 1951 年为约旦国王。

② 1948 年,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 随着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到来, 约旦的社会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巴勒斯坦人逐渐占据半数以上的人口。Omn Winckler, “From Small Sheikdom to Over - Population”, in P. R. Kumaraswamy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30.

③ 孔志强、许勤华 《约旦王国的二元君主立宪制》, 载王彤主编 《当代中东政治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54 页。

④ [英国] 彼得·斯诺著 《侯赛因》,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11 页。

⑤ [美国] 贾恩弗朗哥·波齐著 《国家: 本质、发展与前景》, 陈尧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 第 27 页。

里发之后，在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支持下，其父谢里夫侯赛因自称哈里发，但在伊斯兰世界应者寥寥，反而屡遭抨击。^① 沙特家族不仅占领了哈希姆家族的腹地希贾兹，其推行的瓦哈比主义也对哈希姆家族的宗教地位形成挑战。因此，“哈希姆认同”具有的宗教属性与民族认同存在矛盾，也难以唤起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共鸣。

第二，“哈希姆认同”的泛阿拉伯主义的属性冲淡了约旦的民族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希姆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泛阿拉伯主义”（al-Qawmiyya al-Arabiyya）的色彩。哈希姆家族强调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希望实现在其领导下的阿拉伯统一，在马什里克（Mashriq）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② 当时的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将哈希姆家族称为“阿拉伯国家的拯救者”，声称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哈希姆家族是先知的后裔，领导阿拉伯大起义，像穆罕默德一样行事。^③ 谢里夫侯赛因自称“阿拉伯之王”。^④ 阿卜杜拉之弟，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也指出：“我们是一个民族，东西南部临海，北部则是托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⑤。在这里，阿拉伯民族性超越了伊斯兰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即阿拉伯民族源于闪米特人，迦南人、腓尼基人、迦勒底人、犹太人等都是由阿拉伯半岛迁徙到新月地带的闪米特人。^⑥ 在当时编撰的教科书中，关注的是阿拉伯民族的普遍特征，并不强调外约旦的独特性。^⑦

因此，哈希姆家族统治下外约旦、伊拉克和希贾兹只是阿拉伯统一的第一阶段。相对外约旦的民族认同而言，阿卜杜拉更关注的是阿拉伯的统一。这在当时外约旦的政府构成中也有所体现。在英国委任统治的25年中，外约

① Madawi Al-Rasheed and Carol Kersten Marat Shterin eds., *Demystifying the Caliphate: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47-50.

② “马什里克”（Mashriq）为“阿拉伯东方”之意，指埃及以东的阿拉伯地区。Asher Susser, “Instruction”, in Asher Susser and Aryeh Shmuelevitz eds., op. cit., p. 1.

③ Y. Porath, “Abdallah’s Greater Syria Programm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0, No. 2, 1984, p. 173.

④ Joshua Teitelbau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ashimite Kingdom of Arabia*,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2001, p. 232.

⑤ Riad Nasser,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School Textbook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0, No. 2, 2004, p. 225.

⑥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p. 176-177.

⑦ Riad Nasser,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School Textbook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0, No. 2, 2004, p. 229.

旦共有 18 届政府和 8 名首相，没有 1 名出自外约旦本土，都为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① 这种观念与外约旦的民族认同构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一是外约旦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哈希姆家族已不可能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二是对阿拉伯统一的过分强调事实上削弱了外约旦的地方认同，不利于外约旦的民族认同构建；三是哈希姆家族对于“泛阿拉伯主义”的强调也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出现了“哈希姆派”和“反哈希姆派”^②。哈希姆家族领导的“泛阿拉伯主义”既未赢得阿拉伯人的广泛支持，也未强化外约旦的民族认同。可以说，哈希姆家族借助“泛阿拉伯主义”进行社会动员，但是这种政治理想与现实相违背。

第三，阿卜杜拉将统一“大叙利亚”作为首要的目标。阿拉伯大起义后，哈希姆家族在英国的支持下夺取了外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前还占领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哈希姆家族最直接的目标就是统一大叙利亚地区，并在此地建立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外约旦仅是阿卜杜拉实现这一目标的踏板。^③ 从 1921 年阿卜杜拉就任埃米尔起，直到他 1951 年遇刺身亡，统一大叙利亚一直是外约旦的核心诉求。^④ 1920 年，费萨尔被法国逐出叙利亚，阿卜杜拉随即试图率军“夺回家族的王权”。^⑤ 英国为了安抚阿卜杜拉，将大叙利亚南部的约旦^⑥许给阿卜杜拉。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曾向阿卜杜拉许诺“如果你在外约旦表现良好，能够很好地进行管理，我们希望法国收回他的决定，并将大叙利亚归还于你。”^⑦ 最终，在英国的安抚之下，费萨尔获得了伊拉克的王位，阿卜杜拉也得到了外约旦的统治权。阿卜杜拉将自身视为哈希姆家族的代言人和阿拉伯大起义的继承者，

① 其中 3 名为叙利亚人、3 名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和希贾兹各 1 人。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op. cit., pp. 988-989.

②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April 17, 195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Vol. 5,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p. 1098-1099.

③ Mary C. 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9.

④ Daniel Pipes,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1.

⑤ 杨孝柏、赵培森等著《圣裔的王冠——约旦王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94 页。

⑥ 外约旦属于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地。

⑦ “Abdallah to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 371/20065/7573, February 22, 1936,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from Daniel Pipes, op. cit., pp. 208-209.

特别是在1933年和1935年,阿卜杜拉的兄弟费萨尔和阿里相继去世,阿卜杜拉以哈希姆家族的家长自居,想要继承哈希姆家族在大叙利亚地区领土的统治权,甚至一度试图兼并伊拉克哈希姆王国。^①

阿卜杜拉决心以外约旦为跳板,不断推动家族的理想——统一新月地带的“大叙利亚计划”。^② 终其一生,阿卜杜拉都试图在大叙利亚地区建立统一的国家,甚至在叙利亚、黎巴嫩已实现独立且巴以分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③ 在叙利亚受挫后,阿卜杜拉将目标转向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④ 以提升其在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为了实现其目标,阿卜杜拉于1947年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秘密协议,^⑤ 承认巴以分治,并拉拢土耳其人以增强哈希姆家族的实力,对冲“埃及—沙特集团”的影响力。^⑥ 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约旦占领了部分耶路撒冷城区和约旦河西岸,并于1950年授予所有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以外约旦的公民权,^⑦ 将约旦河西岸和约旦河东岸合并为“约旦哈希姆王国”(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但是,哈希姆家族试图统一“大叙利亚”的诉求并未实现。在英、法实行委任统治的大背景下,哈希姆家族无力统一这一地区。同时,尽管该地区大都为英、法人为制造的国家,但是还是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相较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言,外约旦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上都处于边缘地位。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外约旦对约旦河西岸的兼并,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进入外约旦,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外约旦的族群构成,引发外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对王室的不满。^⑧

总体而言,“哈希姆认同”的三个层次构成了哈希姆家族的三重目标:即获得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哈里发);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在大叙利亚地区建立统一的哈希姆王国。外约旦成为实现这三大目标的重要支点,但三者

① Daniel Pipes, op. cit., pp. 82 - 83.

② Robert B. Satloff, *From Abdullah to Hussein: Jorda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Y. Porath, op. cit., pp. 172 - 189.

③ See Daniel Pipes, op. cit., pp. 71 - 81.

④ Peter Young, *The Arab Legion*, Berkshire: Osprey Press, 1972, pp. 8 - 9.

⑤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3.

⑥ Avi Shlaim, op. cit., p. 87.

⑦ Curtis R. Ryan, op. cit., p. 566.

⑧ See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April 17, 195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Vol. 5,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p. 1094 - 1099.

都超出了外约旦民族国家的界限和能力。尽管阿卜杜拉国王也试图强化外约旦的民族认同，如以外约旦的重要历史遗迹佩特拉古城（Petra）和杰拉什古城（Jerash）作为符号，发行货币和邮票，以便强化外约旦历史的独特性。^①但阿卜杜拉的着眼点仍在于建立统一的大叙利亚国家。其依据在于随着谢里夫侯赛因、阿里和费萨尔的去世，阿卜杜拉成为哈希姆家族的代言人。由于哈希姆家族历史上在阿拉伯谱系和穆斯林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现实中作为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阿卜杜拉认为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大叙利亚地区应该认同于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但是，“哈希姆认同”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内在缺陷。伴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②，哈希姆家族的“泛伊斯兰主义”影响力和政治动员能力受到削弱。其具有的独特宗教身份更多地体现为宗教情感，而非政治认同。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则受到凯末尔主义的影响，强调共和制和平等性，也与哈希姆家族的王朝统治模式形成对冲，反而威胁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哈希姆认同”具有的上述特征也与当时英、法的委任统治相矛盾。而阿卜杜拉试图以外约旦统一大叙利亚地区也并不现实。20世纪初，大叙利亚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为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外约旦以游牧的贝都因人主体，处于大叙利亚文化的边缘地带。大叙利亚地区的民众一般称自己为大马士革人或者是巴勒斯坦人，并不愿意成为外约旦人。^③外约旦在经济上也难以自持，严重依赖英国。从1924年到1944年英国的补贴占外约旦政府收入的比例从28%增加到74%。^④因此，“哈希姆认同”不可能支撑起阿卜杜拉的政治抱负，反而对其在外约旦的统治产生了反噬的效果。一是对约旦河西岸的兼并招致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不满，导致1951年阿卜杜拉遭巴勒斯坦人刺杀身亡；二是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到来并获得公民权根本性地改变了外约旦的族群结构，进一步弱化了外约旦的民族认同，并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三是阿卜杜拉试图合并伊拉克哈希姆王国，导致哈希

①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p. 128 - 129.

② 穆斯林兄弟会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与哈希姆政权保持合作，但其仍是挑战哈希姆家族宗教合法性的重要力量。See Ronen Yitzhak, “Between Reform and Islam: The Arab Spring in Jordan 2011 - 2014”, *Democracy and Security*, Vol. 14, No. 1, 2018, pp. 34 - 37.

③ Daniel Pipes, *op. cit.*, p. 81.

④ Tariq Moraiwed Tell,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Monarchy in Jord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77 - 78.

姆家族内讧。“哈希姆认同”作为中东传统的宗教和政治文化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民族构建的力量，两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哈希姆认同”是哈希姆家族依赖的政治与文化资源。只有通过“对‘哈希姆认同’的重新释义，使之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契合，才能够提升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合法性。

三 “哈希姆认同”的重释与约旦民族建构的历史叙事

阿卜杜拉是现代约旦的缔造者，但仍力图统一大叙利亚地区，最终兼并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他并未真正关注约旦的民族建构。1951年，阿卜杜拉遇刺身亡后，约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一，阿卜杜拉生前曾许诺其侄孙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II ibn Ghazi）继承约旦王位，实现哈希姆家族治下的两国合并，引发了王位继承的争执。^①费萨尔二世要求继承约旦王位，美国则声称“要和平地将约旦并入一个更可行的领土单位。”^②最终，阿卜杜拉之子塔拉勒（Talal ibn Abdullah）即位，随后因身体原因，于1952年逊位于其子侯赛因（Hussein ibn Talal）。其二，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并授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但禁止使用“巴勒斯坦”一词。^③约旦的国名不包含“巴勒斯坦”^④，而是强调“哈希姆认同”作为约旦国家统一的象征。这引起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其三，约旦处于当时阿拉伯世界的边缘地带，人口稀少，^⑤贝都因游牧文化盛行，国内也缺乏醒目的历史遗迹以强化民族认同感，无法整合较为发达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其四，对于约旦乃至大叙利亚地区而言，哈希姆家族属于外来者，约旦的建国与英国的委任统治息息相关，

① See Robert B. Satloff, *From Abdullah to Hussein: Jorda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9-21.

②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ear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Affairs (McGhe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July 20, 1951,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Vol. 5,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pp. 983-984.

③ Philip Mattar, *The Mufti of Jerusalem: Al-Hajj Amin al-Husayni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12;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 151.

④ Nur Köprülü “The Interplay of Palestinian and Jordanian Identities in Re/Making the State and Nation Formation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in Kenneth Christie and Mohammad Masad eds., *Stat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64.

⑤ 外约旦建国之初只有25万人口，最大的城市安曼也仅有3000人，19世纪末该地民众识字率仅为1%。Daniel Pipes, op. cit., p. 72.

缺乏本土的根基。其五，随着纳赛尔主义风行阿拉伯世界，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受到挑战。因此，阿卜杜拉遇刺后，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合法性遭到削弱，约旦民族认同也存在严重问题。

如何构建约旦的民族认同和维系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是哈希姆家族必须面对的问题。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1952～1999年），通过对“哈希姆认同”的重新阐释，将之内嵌于约旦民族认同，以增强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哈希姆家族逐步放弃大叙利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从民族国家语境下重释“哈希姆认同”，宣彰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遗产，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整个约旦的历史记忆。

第一，叙说约旦历史的连续性、独特性和阿拉伯性，塑造哈希姆家族的族长地位。哈希姆家族首先要解决的是约旦作为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独特性问题。为此，哈希姆家族将约旦置于阿拉伯历史的中心地位，强化约旦人的民族认同。诚如前述，约旦建国之前地处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圣地的边缘地带，^①并非统一的行政区域，甚至被认为“没有历史”。^②因此，历史叙事成为哈希姆家族建构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从未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过的民族”，“用历史来发明自己，而且往往使用有关他们过去的想象和传说的图景来证明他们现在的合理性。”^③此外，约旦境内存在多重族群认同，缺乏整体的政治忠诚。^④当时西岸地区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对并入外约旦，强调自身的巴勒斯坦属性和大叙利亚认同。哈希姆家族需要在约旦河东岸的本土居民和巴勒斯坦移民之间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黏合外约旦与约旦河西岸之间的鸿沟。

为此，哈希姆家族利用大叙利亚地区流行的“闪米特起源说”，强化约旦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阐释约旦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独特性。19世纪末，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大叙利亚地区的人口主要为闪米特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地的阿拉伯学者进一步阐发，认为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大叙利亚古代先民源自闪米特人，后者源于阿拉伯半岛。当代阿拉伯人

①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 59.

② Myriam Ababsa and Rami Daher, *Villes, Pratiques Urbaines et Construction Nationale en Jordanie (Cities, Urban Practice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Jordan)*,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1, p. 153.

③ [美国]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国] 王晴佳、[美国] 苏普里娅·穆赫吉著 《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④ 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 - Edwan, *op. cit.*, p. 985.

是闪米特人的后代，闪米特文明的衰落是雅利安人和蒙古—突厥人入侵的结果。^① 借此，包括约旦在内的大叙利亚地区就与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历史联系。这种历史叙事既具有强化阿拉伯统一的意图，也是为了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及迦南主义（Canaanism）^② 竞争，阐释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合法性。^③

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将这种观念植入约旦官方的历史叙事中，强调约旦历史的连续性和重要性，以及约旦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联系，突破了传统的宗教历史叙事。在传统历史观念中，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属于蒙昧时代。^④ 在侯赛因国王统治前期，约旦占有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和耶路撒冷圣城部分地区，凸显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约旦的历史叙事也将巴勒斯坦的历史纳入其中，贯穿着“闪米特—易卜拉欣—阿拉伯”的历史线索，强调闪米特人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而来，自易卜拉欣以来约旦一直是阿拉伯人文明的中心。^⑤ 而约旦本土的著名历史遗迹佩特拉古城（Petra）则被视为闪米特后裔纳巴泰人（Nabataeans，又译作“奈伯特人”）所创造。在约旦的教科书《阿拉伯民族》（al - Watan al - ‘Arabi）中就写道，纳巴泰人并非约旦本土居民，而是源自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佩特拉城是当时近东文明和贸易的高峰。^⑥ 伊斯兰教诞生后，穆罕默德“解放”了约旦，^⑦ 约旦的耶路撒冷又成为第三大圣地，奥斯曼人的崛起使阿拉伯人开始衰落并丧失了民族认同观念。因此，约旦被赋予了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具有的神圣起源和圣地特征，凸

① C. Ernest Dawn “The Formation of Pan - Arab Ideology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0, No. 1, 1988, p. 70.

② “迦南主义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培育了犹太人的孤立主义，将古希伯来文化从它的闪米特土壤中根除”，强调希伯来文化的闪米特属性。其代表人物乌利·阿夫内利（Uri Avneri）支持“统一约旦计划（Itihad al - Urdun）”，试图将约旦河东岸并入“大以色列”。Klaus Hofmann “Canaanism”,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7, No. 2, 2011, p. 286.

③ 犹太复国主义强调巴勒斯坦是“应许之地”，但阿拉伯人则借“闪米特起源说”消解犹太人的主张，认为迦南人也是闪米特人，在古代犹太人达到巴勒斯坦之前已建立国家。

④ 即“查希里叶（Jahiliyyah）”时代。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53, pp. 87 - 88.

⑤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p. 153 - 155.

⑥ Ibid., p. 155.

⑦ Riad Nasser “Identity beyond Border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st - Colonial Alternative”, *Social Semiotics*, Vol. 29, No. 2, 2019, p. 157.

显了约旦历史的独特性。^①

但是，哈希姆家族在强调约旦本土性的同时，也将约旦河东西岸置于统一的阿拉伯历史框架之中，力图化解境内外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的认同隔阂。侯赛因国王将约旦民族中外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比作先知时代的“迁士”（Muhajirun）和“辅士”（al-Ansar），都要服膺于哈希姆家族领袖，即侯赛因国王的领导。^② 侯赛因国王将自己形容为“巴勒斯坦人民最强大，也是唯一的保护者。”^③ 他还强调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组成了“统一的约旦家庭（al-Usrah al-Urduniyyah al-Wahidah）”^④，哈希姆认同是其中的黏合剂，约旦国王则是“约旦家庭之父”。^⑤ 1967年，约旦丧失西岸地区后，约旦历史教科书的地图中仍将西岸标注为约旦领土。^⑥ 1994年后，约旦的教科书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但地图上仍将以色列标注为巴勒斯坦。^⑦ 2010年，约旦教科书中的地图仍将地中海东岸作为约旦的西部边界。^⑧ 这不仅反映了约旦独特的民族认同观念，更是约旦、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复杂关系的体现。

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强调约旦的阿拉伯属性，以及约旦在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约旦通过重新阐释“哈希姆认同”将约旦的文明与哈希姆家族相关联，使哈希姆家族成为约旦历史叙事的中

① Riad Nasser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School Textbook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0, No. 2, 2004, p. 235.

② Adnan Abu Odeh, *Jordanians, Palestinians, and the Hashemite Kingdom: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p. 211.

③ Betty S. Anderson, *Nationalist Voices in Jordan: The Street and the Stat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 199.

④ J.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New York, Chichester and West Susse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5.

⑤ Stefanie Nanes “Choice, Loyalty, and the Melting Pot: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4, No. 1, 2008, p. 90.

⑥ Iris Fruchter-Ronen, “The Palestinian Issue as Constructed in Jordanian School Textbooks, 1964-94: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Narrativ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9, No. 2, 2013, p. 289.

⑦ Iris Fruchter-Ronen, “Self and Others in Jordanian Textbooks, 1964-2010: A Reflection of Jordan’s National Identity Challenge”, in Elie Podeh and Samira Alayan eds., *Multiple Alterities: Views of Others in Textbooks of the Middle East*,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80.

⑧ See G. M. T. Abdallah, *Al-Thaqafa Al-Ama*, Amman: Wizarat Al-Tarbiyya wa-al-Taalim, 2008, pp. 117-118; Y. K. Shadifat et al. eds., *Al-Tarbiyya Al-Igtimaiyya Wa-Al-Wataniyya*, Amman: Wizarat Al-Tarbiyya wa-al-Taalim, 2007, pp. 25, 31-32, from Iris Fruchter-Ronen, “The Palestinian Issue as Constructed in Jordanian School Textbooks, 1964-94: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Narrativ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9, No. 2, 2013, p. 292.

心,进而形成了“阿拉伯历史—约旦历史—哈希姆家族历史”环环相扣的历史叙事逻辑。如前所述,“哈希姆认同”具有多个维度,约旦正是从民族建构的视角出发,对“哈希姆认同”的上述层面进行重新释义。将对哈希姆家族的认同与约旦民族认同同一化,淡化了哈希姆家族作为外来统治者的属性。

第二,强调哈希姆家族与约旦历史和本土文化的密切联系,淡化作为外来者的形象。约旦官方的历史叙事强调国家的阿拉伯属性,尤其是闪米特—阿拉伯人对于约旦历史的塑造。哈希姆家族来自于阿拉伯半岛,在部落谱系上最为尊贵。侯赛因国王明确指出,我来自哈希姆家族、古来氏部落,属于麦加最尊贵的部落。^① 根据传说,阿拉伯人分为两支:北部为阿德南人(Adnan),是易卜拉欣之子伊斯玛仪的后裔;南部为卡坦人,是闪(Shan)的后代。哈希姆家族则是阿德南人与卡坦人通婚的结果,为易卜拉欣的直系子孙,象征着阿拉伯人的联合,是阿拉伯社会中最为尊贵者。^② 按此逻辑,早期的闪米特人、易卜拉欣、伊斯玛仪的祖地皆为阿拉伯半岛,他们都曾在约旦生活。

借此,哈希姆家族作为易卜拉欣的后裔,便不再是约旦的外来统治者,而是深植于阿拉伯历史和社会之中,甚至代表着约旦乃至阿拉伯人的荣誉。约旦的教科书中就指出,穆罕默德的高祖哈希姆·伊本·阿卜杜·麦纳夫(Hashim ibn Abd Manaf)就曾在约旦生活,^③ 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中的作用无与伦比。^④ 约旦官方在宣传时甚至指出,曾在佩特拉创造文明的纳巴泰人也与哈希姆家族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⑤ 此外,哈希姆家族也强调与约旦本土贝都因部落的联系。贝都因部落是约旦社会的主体,部落谱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赢得贝都因部落社会的支持显得十分重要。侯赛

① *Jordan Times*, January 28, 1985, from Andrew Shryock “Dynastic Modern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 Testing the Limits of Tribalism, Pluralism, and the King’s Example in Hashemite Jordan”,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22, No. 2, 2000, p. 63.

②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 118.

③ Mustafa Murad al - Dabbagh, *al - Mujaz fi Tarikh Filastin mundhu Aqdam al - Azmana hata al - Yawm (A Concise History of Palestine from the Most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Beirut: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57, pp. 9 - 13, from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 173.

④ Riad Nasser “Identity beyond Border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st - Colonial Alternative”, *Social Semiotics*, Vol. 29, No. 2, 2019, p. 158.

⑤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 154.

因国王曾言“约旦的部落一直是我们的联盟的中心，很早以来就是我们尊严的来源和关注的目标。约旦部落是我们的亲族”。^①由此不难发现，哈希姆家族通过将约旦的历史“阿拉伯化”，阿拉伯历史的“哈希姆化”，使哈希姆家族成为约旦历史认同的中心。尽管侯赛因国王时期，仍然强调泛阿拉伯的认同，但其目标指向的是约旦的阿拉伯起源，不同于阿卜杜拉国王时期对于阿拉伯政治统一的追求。

第三，哈希姆家族强化圣裔的色彩和圣地守护者的角色，形塑约旦的独特性。哈希姆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长期担任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城的守护者，具有传统的宗教与政治地位。侯赛因国王是穆罕默德的39世孙。^②他借助哈希姆家族的圣裔光环，赋予约旦在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独特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提升了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政治合法性。^③具体而言，一方面，哈希姆家族强调其作为圣裔的崇高的宗教地位，但同时弱化“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在约旦的教科书中，有大量的篇幅介绍伊斯兰教，尤其是哈希姆家族在伊斯兰历史中的地位。^④其中，书中反复强调，“哈希姆王朝与先知穆罕默德相关，真主祝福他们，他们来自哈希姆的祖先古来氏部落。”^⑤“神赋予我们亲爱的阿拉伯国家以最高贵的尊严和最伟大的品质”，“神圣的约旦，伊斯兰教的摇篮”，也是“神圣的宗教与文明的诞生地”。^⑥这为哈希姆家族统治约旦提供了宗教的合法性，也赋予约旦以宗教的神圣性。而在约旦的官方历史叙事中，其他阿拉伯国家没有与约旦相似的神圣起源，也不具有约旦的圣地特征。

另一方面，哈希姆家族也利用圣地守护者的角色，将自身置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增强约旦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倭马亚王朝时期，哈希姆

① *Jordan Times*, July 4, 1998, from Andrew Shryock, op. cit., p. 63.

② 梁国诗《当代约旦哈希姆王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哈希姆家族家谱见本书第25~28页。

③ Myriam Ababsa and Rami Daher, *Villes, Pratiques Urbaines et Construction Nationale en Jordanie (Cities, Urban Practice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Jordan)*,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1, p. 147.

④ Lina Edward Khamis, *Cultural Policy in Jordan: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Cham: Springer, 2018, p. 69.

⑤ Ya'cob al - Dajani, Yunis al - Suqi, Abed al - Latif al - Barchuthi, Esa Abu Shaikhah, Lutfi Adnan, Nimir al - Ma' ddi and Ibrahim Othman, *Wattani al - Saghir (My Small Motherland)*, Amm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66, p. 12, from Riad Nasser,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School Textbook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0, No. 2, 2004, p. 234.

⑥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 185.

家族已开始担任麦加谢里夫。此后，麦加谢里夫一职长期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担任，这也为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所承认。1517年，麦加谢里夫巴拉卡特（Barakat）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换取“圣地守护者”的头衔，负责管理麦加的朝觐事务。^①“圣地守护者”也成为哈希姆家族重要的宗教政治遗产。哈希姆家族占领外约旦后，于1924年获得耶路撒冷圣地的保护权。^②然而，1925年，哈希姆家族的希贾兹王国被沙特家族攻占，失去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保护权，耶路撒冷对于哈希姆家族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因此，从阿卜杜拉国王开始，约旦将耶路撒冷的保护权视为核心利益。即便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约旦失去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但它仍然具有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的守护权。1994年的《华盛顿宣言》和《约以和平条约》保留了哈希姆家族对耶路撒冷的“谢里夫圣地”（Haram al-Sharif）的监护权。^③圣地保护权也成为约旦官方历史叙事的重要内容，被形容为哈希姆家族的历史责任^④。谢里夫侯赛因葬于耶路撒冷^⑤，阿卜杜拉国王在耶路撒冷遇刺，^⑥无不说明哈希姆家族与耶路撒冷的联系。20世纪，哈希姆家族出资四次大规模修缮耶路撒冷的圣地。^⑦哈希姆家族通过“圣裔”和圣城保护者的身份，客观上提升了约旦在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哈希姆认同”与约旦民族认同也呈现出共生的关系。

① Randall Baker, *King Husain and the Kingdom of Hejaz*, Cambridge: The Oleander Press, 1979, p. 2.

② Joshua Teitelbaum “‘Taking Back’ the Caliphate: Sharif Husayn Ibn ‘Alī, Mustafa Kemal and the Ottoman Caliphate”, *Die Welt des Islams*, New Series, Vol. 40, Issue 3, 2000, pp. 421-424.

③ 《华盛顿宣言》第三条原文为“以色列尊重约旦哈希姆王国目前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的特殊作用。在就永久地位进行谈判时，以色列将优先考虑约旦在圣地的历史作用。此外，双方同意共同行动以促进三大一神教之间的关系”《约以和平条约》第九条原文为“根据《华盛顿宣言》，以色列尊重约旦哈希姆王国目前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中的特殊作用。在就永久地位进行谈判时，以色列将高度优先考虑约旦在这些圣地的历史作用。” See Isre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July 25, 1994, <https://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Guide/Pages/The%20Washington%20Declaration.aspx>, 2019-08-10; Office of King Hussein I,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October 26, 1994, <http://www.kinghussein.gov.jo/peacetreaty.html>, 2019-10-15.

④ Ahmad El-Sharif, *op. cit.*, p. 43.

⑤ Kimberly Katz, *Jordanian Jerusalem - Holy Places and National Spac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5, pp. 31-33.

⑥ Betty S. Anderson, *op. cit.*, p. 199.

⑦ See “Custodianship over Holy Sites”, <https://www.kingabdullah.jo/en/page/the-hashemites-custodianship-over-holy-sites>, 2019-01-11.

第四，约旦王室通过“哈希姆认同”的现代化释义，强调其时代性与进步性。哈希姆家族通过强调阿拉伯属性和圣地特征，成功地构建了哈希姆家族在约旦宗教和历史上的合法性。然而，这些毕竟是传统认同，与现代约旦国家的产生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侯赛因国王时期开始叙说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历史功绩，着力构建现代约旦国家缔造者的形象。约旦教科书指出，哈希姆家族领导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大起义，重新激发了阿拉伯统一和民族主义观念，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最终缔造了现代约旦国家。^① 哈希姆家族也强调，“源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哈希姆遗产就是倡导进步、繁荣与和平”，这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现代精神相吻合。^② 借此，法国大革命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起点，而哈希姆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则成为现代阿拉伯世界尤其是约旦历史的开端，哈希姆家族是联结现代西方文明和阿拉伯遗产的纽带。在约旦的现代历史博物馆中，其历史叙事逻辑凸显哈希姆家族的重要性，将现代约旦的历史追溯到希贾兹的哈希姆家族，现代约旦的历史就是哈希姆家族的历史，哈希姆家族的到来使约旦避免了陷入部落的混乱之中。^③ 约旦教科书也指出，现代约旦的成就、国际地位与哈希姆家族密不可分。^④

哈希姆家族着力强化自身改革者的形象，将锐意改革作为其使命。^⑤ 这不仅是为了回应民众的改革诉求，也被叙说为哈希姆家族的追求。故此，哈希姆家族颁布宪法和设立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度，以及赋予男女平等的教育权，进而塑造民主、开放和自由的现代君主形象。^⑥ 而侯赛因从小接受英国的教育，他的两位妻子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也凸显了他西方化和世俗主义者的色彩。^⑦

由此，侯赛因国王时期，约旦对于“哈希姆认同”进行了重新阐释，放

① Elena D. Corbett, op. cit., p. 167.

② Ahmad El - Sharif, op. cit., pp. 44 - 45.

③ Myriam Ababsa and Rami Daher, *Villes, Pratiques Urbaines et Construction Nationale en Jordanie (Cities, Urban Practice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Jordan)*,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1, pp. 155 - 156.

④ Lina Edward Khamis, op. cit., pp. 69 - 70.

⑤ Ahmad El - Sharif, op. cit., p. 46.

⑥ See Elena D. Corbett "Hashemite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Iconography in Neoliberal Jorda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2, 2011, pp. 179 - 186.

⑦ Andrew Shryock, op. cit., p. 58.

弃了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叙利亚主义的政治诉求。但并未抛弃“哈希姆认同”背后的传统认同观念，而是将之与约旦国家认同联结，呈现出约旦历史的连续性与独特性。“哈希姆认同”则是将约旦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的纽带。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今天的族群与他们的远古历史之间存在一种被感受到的血统承继和文化亲缘关系。他们的共同体正是在这段历史中形成的”。^① 哈希姆家族具有了圣裔、阿拉伯领导人、圣地保护者、贝都因谢赫、现代化的推动者等多重形象，迎合约旦人不同的诉求。换言之，就是以“哈希姆认同”建构约旦民族的独特性与认同感。这不仅使哈希姆家族摆脱了外来者的形象，使之深植于约旦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其圣裔身份也提升了约旦的国家认同。借此，哈希姆家族成为现代约旦的缔造者，约旦也因哈希姆家族具有了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神圣起源。约旦国家认同与“哈希姆认同”合二为一。^② 这种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约旦建国之初在民族认同方面的难题，同时也强化了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合法性。

四 余论：“哈希姆认同”、政治稳定与民族建构的路径

身份政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是当代中东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影响中东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③ 特别是 2010 年末中东剧变以来，基于特定部落、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愈加凸显，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则遭到削弱。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黎巴嫩等中东国家都存在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约旦相对成功地建构了国家认同，不仅使这样的一个人造国家具有了集体认同观念，而且也赋予了作为“外来者”的哈希姆家族以政治合法性。在这一进程中，哈希姆家族对于约旦国家的历史叙事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简而言之，通过对约旦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叙说，凸显出哈希姆家族在约旦历史尤其是现实中的核心地位。借此，对于哈希姆家族的认同与对约旦的认同趋于一致，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哈希姆家族成为约旦民族认

① [英国] 安东尼·D. 史密斯著 《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 年版，第 44 页。

② Riad Nasser,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School Textbook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0, No. 2, 2004, p. 235.

③ See P. R. Kumaraswamy, “Who Am I? The Identity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No. 1, 2006, pp. 63 - 73.

同的象征与符号，其“圣裔”属性和“圣地保护者”的角色也成为约旦区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底色。

阿卜杜拉二世继位以来，对“哈希姆认同”进行了新的诠释，以适应新形势，强化约旦的民族认同和哈希姆家族的合法性。约旦仍然强调哈希姆家族作为圣裔和圣地保护者的角色，以及阿拉伯大起义领导者的地位。2013年3月31日，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和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在安曼签署了一项协定，重申约旦对耶路撒冷圣地的管理权，并指出约旦国王有权尽一切法律努力保护这些圣地，特别是阿克萨清真寺，该清真寺和周边地区被界定为“谢里夫的圣地”。“随着约旦国家的崛起，在哈希姆领导人的庇护下，保护耶路撒冷圣地的努力仍在继续。”^①同时，阿卜杜拉二世积极参与巴以问题的调停，为巴勒斯坦人发声，以回应国内巴勒斯坦人的诉求。

但阿卜杜拉二世更为关注哈希姆家族对于现代约旦的重要意义，凸显哈希姆家族是约旦现代化的开拓者和改革者，哈希姆家族将推动约旦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繁荣和民主时代。阿卜杜拉二世强调“司法独立、行政改革与民主化进程应以宪法为基础。”^②2011年约旦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国王进行改革，阿卜杜拉二世则将“哈希姆认同”与宪政改革相联系，将哈希姆家族冠之以“改革主义者”^③，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垄断对宪法的解释权。^④

在阿拉伯认同的基础上，哈希姆家族开始重点叙说约旦本土多元的族群认同。例如，在首都安曼新建的“历史长廊”，以浮雕的形式展现约旦的历史演

① “Custodianship over Holy Sites”, <https://kingabdullah.jo/en/page/the-hashemites/custodianship-over-holy-sites>, 2018-10-02.

② “Speech from the Throne”, By His Majesty King Abdullah II Opening the Third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13th Parliament, Jordan, Amman, November 1, 1999, <https://www.kingabdullah.jo/en/speeches/openin-third-ordinary-session-13th-parliament>, 2019-01-13.

③ 2011年4月26日，阿卜杜拉二世在致信艾哈迈德·洛兹（Ahmad Lozi）时将约旦的宪政改革与“哈希姆认同”相联系。“A Letter to Mr. Ahmad Lozi”, April 26, 2011, from Ahmad El-Sharif, “Constructing the Hashemite Self – Identity in King Abdullah II’s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6, No. 1, 2014, p. 46.

④ “Author Interview with Taher al-Masri, Speaker of the Senate”, Amman, Jordan, June 9, 2013, from Hassan A. Barari “The Persistence of Autocracy: Jordan, Morocco and the Gulf”,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4, No. 1, 2015, p. 105.

进,将之追溯至公元前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同时也体现了约旦人、巴勒斯坦人、切尔克斯人、贝都因人的不同风俗和文化风貌。^①而在浮雕的最后,则以橄榄树的形式呈现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谱系,哈希姆家族则处于主干的地位。

可以说,“哈希姆认同”成为约旦政治稳定的重要支撑。这赋予了哈希姆家族统治约旦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在某种程度上使约旦在近年来剧烈动荡的中东局势中独善其身。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将政治合法性定义为:政治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和能力。”^②本质而言,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对于国家的认可程度。“哈希姆认同”兼具历史文化、阿拉伯民族、宗教和宪政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不同的约旦人对国家的想象。这赋予了哈希姆家族在塑造政治合法性与正统性时的多重选择。同时,哈希姆的君主也重视塑造自身的平民、亲和、平等与勤政的形象,^③使哈希姆家族成为阿拉伯人的榜样。

“哈希姆认同”还为约旦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不同于阿卜杜拉时期借助“哈希姆认同”进行对外扩张,^④侯赛因国王将之限制于约旦国内,剪除了其跨民族和国家的属性,奉行所谓的“小国大外交”,即借助哈希姆家族的独特影响力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对热点问题进行斡旋。^⑤因此,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而言,哈希姆家族由麻烦的制造者转变为和平的塑造者,进而极大地提升了其在中东的影响力。约旦在中东地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交“零问

① Elena D. Corbett, “Hashemite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Iconography in Neoliberal Jorda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2, 2011, pp. 181-185.

② [美国]李普塞特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聂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③ 约旦官方称“1950年,只有10%的约旦人可以获得自来水、卫生设施和电力,而到今天(指1999年),这一比例已达到99%。1960年,只有33%的约旦人识字,而到199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5.5%。1961年,约旦人平均每天摄入2198大卡路里能量,到1992年,这一数字增加了37.5%……侯赛因国王一直认为约旦人民是约旦最大的财富,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他鼓励所有人——包括不那么幸运的人、残疾人和孤儿——为自己和他们的国家取得更多成就。”See “Biography of King Hussein bin Talal”, <http://www.kinghussein.gov.jo/biography.html>, 2019-01-17.

④ Ronen Yitzhak, “The Assassination of King Abdallah: The First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in Jordan: Did It Truly Threate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21, No. 1, 2010, pp. 70-73.

⑤ 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认为约旦在外交斡旋中的重要性与其内在的规模和权力完全不成比例。Beverly Milton-Edwards and Peter Hinchcliffe, *Jordan: A Hashemite legacy*,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

题”。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葬礼上，包括美国、俄罗斯等 80 余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元首、领导人，以及 100 多名其他国家代表出席，甚至长期敌视阿拉伯君主制的叙利亚、伊拉克都分别派出了总统和副总统出席。^①可以说，“哈希姆认同”的重新释义成为约旦外交政策转型的基础，进一步增强了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合法性。

尽管“哈希姆认同”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约旦的稳定和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但在新的时代，“哈希姆认同”仍然存在隐忧。一是“哈希姆认同”具有多个层面的内涵，这既是哈希姆家族的政治资源，同时也是负担。阿拉伯认同、伊斯兰认同、宪政之下的人民主权观念等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其中不乏矛盾之处。因此，使各个方面达到平衡，以满足不同社会背景的约旦人的诉求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二是“哈希姆认同”作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成为哈希姆家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渊源，但仍需要现实的依托。约旦经济对外部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具有较大的依赖。近年来，约旦的经济发展并不理想，失业率高企，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油价低迷的背景下，约旦侨汇和旅游业都受到严重冲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7 年以来，约旦的经济增长率徘徊在 2% 左右。2020 年，约旦的经济增长率为 1.8%。^②2020 年第一季度失业率达到 19%。^③“哈希姆认同”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无法抵消社会经济的衰退。三是约旦社会也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如农村的部落文化和城市的世俗化、现代化，^④以及受到西方影响的新一代的社会阶层和失业青年等。他们倾向于世俗化，约旦部分知识分子、世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将约旦的发展问题归结为哈希姆君主制，对君主制度持否定态度。^⑤“哈希姆认同”存在被消解的隐忧。四是哈希姆家族试图以阿拉伯认同来掩盖约旦本土居民与巴勒斯

① Nigel Ashton, *King Hussein of Jord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 - 3.

② The World Bank, “Jordan’s Economic Update, April 2021”,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9affb87e291b0fee6409b48cb4d65f02-0280012021/original/7-mpo-sm21-jordan-jor-kcm3.pdf>, 2021-09-04.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经济学家呼吁施策应对失业》，<http://jo.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9/20200903001041.shtml>, 2020-10-20.

④ Lina Edward Khamis, op. cit., p. 7.

⑤ Ronen Yitzhak, “Between Reform and Islam: The Arab Spring in Jordan 2011 - 2014”, *Democracy and Security*, Vol. 14, No. 1, 2018, pp. 24 - 44.

坦人的差异。如今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已占到 70% 左右,^① 但其在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巴勒斯坦人对此心存不满。2011 年爆发了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 要求国王进行改革。^② 五是中东乱局对约旦国家认同具有影响。叙利亚内战导致大量难民流入约旦; 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建交使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边缘化, 为约旦的外交以及国内治理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后, “哈希姆认同”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它尽管在约旦的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 中构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和认同观念, 但约旦仍然有诸多非阿拉伯族裔, 对于后者而言, “哈希姆认同” 无疑具有排他性。

大部分中东国家是在帝国体系和殖民体系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 某种意义上是“人造”的国家, 存在跨界认同、地方认同强大, 而国家认同虚弱的问题。建构现代国家认同成为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也是实现国家稳定必须经历的历史进程。鉴此, 约旦民族建构问题在中东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约旦作为“沙聚之邦”, 其统治者哈希姆家族又属于域外力量, 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哈希姆家族利用其独特的传统宗教和文化身份建构现代国家认同, 巧妙地将哈希姆家族与约旦合二为一。这成为继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外,^③ 中东民族构建的第三条道路, 即将民族主义与传统宗教认同相结合, 通过历史遗产叙说现实的政治合法性。

相对而言, 世俗民族主义的建构道路切断了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 具有西方化的色彩;^④ 伊斯兰主义的道路则强调回归政治传统, 具有保守主义的属性, 甚至反对现行的中东民族国家体系。这两者也构成了现当代中东民族建构之钟摆的两极。因此, 中东民族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存在一定的钟摆现象。约旦民族建构的经验表明, 在这一钟摆之间存在传统与现代、东方

① 根据约旦官方统计, 巴勒斯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 43%, 但普遍认为占到半数以上。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Reform: Jordanian Democratization and Regional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eport, Amman/ Brussels, 2003 - 10 - 08, p. 8;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eastern-mediterranean/jordan/challenge-political-reform-jordanian-democratisation-and-regional-instability>, 2019 - 11 - 10.

② Curtis R. Ryan, op. cit., p. 564.

③ 参见闫伟 《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文化整合与族际关系》, 载《世界历史》2017 年第 3 期, 第 95 ~ 108 页。

④ 参见李芳洲 《中东民族主义与政治发展: 历史、现实及前景》, 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7 期, 第 77 ~ 91 页。

与西方之间的平衡点。哈希姆家族利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宗教身份建构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国家认同，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维系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巧妙地实现了两者的平衡。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言：“对现代性主题的挪用，使这些群体（非西方）可能将现代性的某些西方普遍主义要素整合到自己新的集体认同建构之中，而不必放弃他们传统认同的特殊成分”，“这种传统认同经常用普遍主义，特别是宗教术语得以表述”。^①这无疑是对中东国家的民族建构、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和启示：即将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认同资源现代化，赋予其现代性的阐释，借此建构现代国家制度、认同观念和社会治理方案，可能是一条更为稳妥的国家转型路径。

事实上，约旦的民族构建路径在中东并非个案。中东地区出现的所谓“土耳其模式”^②，就是将伊斯兰政治传统与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中东的君主制国家大都是借助传统的部落或宗教政治文化来阐释现实的政治合法性，将对王室的认同与国家认同融合。不同之处在于，对海湾阿拉伯君主国而言，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福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疏解了社会的压力，赋予王室统治以合法性，进而维持着这些相对保守的君主国的稳定。对没有石油资源又处于中东动荡旋涡的约旦而言，能够维持长期的稳定难能可贵。这也是中东君主国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之维。但是，在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的持续分化、社会文化的变革、世界能源价格走低等潜在问题出现，约旦等阿拉伯君主国如何进一步基于传统文化建构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认同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影响这些君主国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美国] S. N. 艾森斯塔特著 《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页。

② 相关讨论参见：王林聪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82~97页；管涛 《“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0~22页。

social order. In the future, how to achieve the modernized transformation of customary land regimes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 reviving will be the core agenda of Ghana's land reform.

Key words: Ghana; customary land regime; chieftain; land reform

South Africa's Foreign Aid: Identity and Strategic Choice

Zhuo Zhenwei & Luo Jianbo

Abstract: South Africa is a regional power in Africa and an important advocate and promoter o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renaissance and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South Africa is also a middle power and emerging country, with a certain influence and discourse power in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nd North – South dialogue. The triple identity jointly shapes and influences the goals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South Africa's foreign aid, and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es the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foreign aid. The ANC – led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five strategic goals, namely, to lead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advance African 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 to promote Af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shape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to enhance global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In its foreign aid practice, South Africa adheres to Afrocentrism, implementing the aid norms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ously increas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However, South Africa is also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weakening of national power, degradation of African identity, and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As a result, the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of foreign aid are significantly restricted. How to resolve the huge gap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must be resolved in South Africa's foreign aid.

Key words: South Africa; foreign aid; South – South co – operation; African renaissance; African integration

“Hashemite Identity”: The Content and Evolution of Jordanian Political Culture

Yan Wei & Tian Hongtao

Abstract “Hashemite Identity”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family of Muhammad,

the founder of Islam. With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it has gradually had the connotation of religious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and even identity of Arab nationalism. After Jordan was founded in 1921, it faced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how to construct nation identity. When King Abdullah focused on the “Hashemite Identity” to promote the Unity of the Arab world, especially the Greater Syria,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was not the main concer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under the rule of King Hussein, Jordan made a new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Hashemite Identity”, that is, under the context of Arabism, it emphasized the role of Banu Hashim to the native nature of Jordan, the identity of Ahl al – Bayt and the custodianship of the holy sites,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modern Jordan. Thus, Jordan’s history has continuity, and the Banu Hashim also has uniqueness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Banu Hashim, in turn, has sought to soften its image as Jordan’s “outsider” and boost its political legitimacy. “Hashemite Identity” and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re combined into one, reflecting som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Jordan has modernized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political culture and made it the resource and power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It has also become a unique nation building path in addition to secular nationalism and Islamism, and in a sense is the key to the stability of modern Jordan. But in the new era, “Hashemite Identity” still faces challenges.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Jordan “Hashemite identity”; nation – building; political stability

(责任编辑: 李文刚 责任校对: 詹世明)